

思想周刊

观点

新论

思想者

文史

■ 段钢

我们要有怎样的启蒙

启蒙是五四运动的旗帜。什么才是中国人需要的启蒙,曾经有过各种摸索和讨论。

中国社会是一个注重生命情感和生命体验的社会。孔子经常谈“仁”,却并未刻意用一个固定的定义去框定,而总是鼓励人们自己去生命场景中领悟。这种对生命的感悟,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存在和演化的基础。

真正的启蒙,应该摒弃简单的理性中心主义,要构建一种“情+理”结构的现代启蒙范式,寻求理性和情感的合理平衡。五四时期反省的一个结果就是,除去器物 and 制度层面之外,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改造中国的文化系统同样紧迫。实践一再证明,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或理性强权的要求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绝不应该简单搬用。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实践的主体是人,人的本质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决定的。人类在创造世界的实践中,也在不断地创造自己,从而使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有一个历史性的生成过程。不同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里提到那个“好汉”,以为脑子里去除掉重力的观念就不会淹死了,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真正带来进步的是不断的实践,真理来自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之中。五四运动百年来的历史证明,唯有深入中国自身的实践,才能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五四运动可以有多种理解,但最重要的是深入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

《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亲民,就是要到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去,在实践中发现真理,而不是按通常的理解去用观念“新”民。五四时期,一些团体、势力提出的各种思潮往往是观念先行,并机械地用来指导实践。这些看似热闹的思想实践,值得反省和总结。根本的一点在于,它们对中国本土的实践重视不够,总结不够,认识不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深得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最终得以领导全国人民夺取革命的胜利。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前进道路上依然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这样的坚持和创新,是对五四运动的经验总结,是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科学报社长、总编)

文体和道德层面的“两个革命”

■ 程伟礼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由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因而人们常常将其并列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角度出发,回溯道德革命这一历史现象,并予以认真的哲学分析,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会有所启迪。

创造便于文化传承的载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由文体和道德两个层面上的革命构成。

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体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其中,虽然出现过取消汉字、取消汉语的过激主张,但经过无数有识之士的努力,中国文化最终在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上达到一致,客观效果上使文体革命成为国人普遍接受的文化革新,为民众创造了便于文化传承的载体。

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道德革命,冲破封建礼教束缚,有力倡导了个性解放。特别是,引进科学和民主的进步理念,融汇成思想解放和民族意识觉醒的壮丽诗篇,谱写出了救亡图存的伟大篇章。不过,它留下诸多两难的价值困境,至今仍在考验国人的智慧。

五四前后,主张道德革命的知识分子围绕新旧道德,论证了道德革命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道德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具有“九重”罪名。诸如等级观念、惠民政策、简单的二元思维(非君子即小人)以及只重阐述不重原创、迷信古人不思进取、歧视女性,等等。他们强调,传统的德治主义和礼治秩序是靠仁、义、礼、智、忠、孝等道德规范维护的,公德问题的提出使传统私德体系受到怀疑和批判,加之五四时期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凸显,致使道德革命成为必然之势。

平心而论,道德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引进西方思想来批判传统,如引进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批判私德,引进西方实用主义思潮试图改造传统思想体系等,不一而足。从接受效果的跨文化角度来考察,道德现实主义者引进西化思潮造就了“什么都可以怀疑唯独科学不能怀疑”,并且造就了“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的两难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道德革命。

谨防“独尊儒术”思维定式

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对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及其关系进行认真反思,如何重塑国民道德精神世界并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使命。其中,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审视。

■ 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体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其中,虽然出现过取消汉字、取消汉语的过激主张,但经过无数有识之士的努力,中国文化最终在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上达到一致,客观效果上使文体革命成为国人普遍接受的文化革新

■ 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道德革命,冲破封建礼教束缚,有力倡导了个性解放。特别是,引进科学和民主的进步理念,融汇成思想解放和民族意识觉醒的壮丽诗篇,谱写出救亡图存的伟大篇章。不过,它留下诸多两难的价值困境,至今仍在考验国人的智慧

其一,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综观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不难发现,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之间存在一种时隐时现的内在联系。现代新儒学无疑是一种“从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

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感觉到西方文化思想的震荡与影响,思考如何调整、发扬中国文化学术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其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作为儒学改革运动的先驱,为现代新儒学的出台起过铺垫作用。

儒学改革重在传统创造性转化,在思维方法上西学起到了工具性作用。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借助于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创建了“儒学复兴论”;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借用康德、黑格尔哲学改造儒学,提倡“儒学转化论”;第三代新儒家则依据哲学释义学改造儒学,建立了“儒学创造性转化论”。

第三代新儒家受过良好的中西文化和哲学训练,善于运用新的方法、语言并结合现代人的存在感受,对儒家思想进行一种现代诠释与阐发。他们所强调的人文主义与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而是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却又不是现实政治势力的一个环节,从而具有相当深厚的批评精神,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也就是所谓“圣王”的理想。

如何从“内圣”开出“外王”,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将西方哲学释义学方法论与中国传统诠释学方法论相结合,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分析工具。

其二,道德自律何以可能?五四道德革命主张的公德心战胜私德,核心在于培育自主自律的道德修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自主自律思想建设具有正能量作用的,莫过于强调以“破心中贼”为己任的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关于道德自律的第一个理由是“心即理”及“心外无理”。王阳明主张“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即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强调从“心上做功夫”。他认为,事父、事君、交友、治民的理不可能到父、君、友、民那里去寻找,而是“都只在此心”,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孝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即是信,发之治民便是仁。

由此可见,阳明心学既强调道德行为是

由道德意志生发而来的,又强调道德自律自主是人心的内在本质,从而为人心道德找寻本体论的根据。

阳明心学关于道德自律的第二个理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论而提出的。从伦理学角度来看,阳明心学中的“知”实质上是一种德性之知,即“是为良知,而非知识也”。

王阳明强调的“知行合一”,指的是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这正是理解阳明心学具有正能量作用的关键所在。其中的“行”,不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道德实践活动,而且是主体道德自律、自主的判断活动。

“知行合一”说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既突出道德意识的内在性、能动性,又强调人们的道德意识对道德实践的确定性,使人自觉依循内心的道德规范,并付诸于实践活动。

阳明心学关于道德自律的第三个理由是“致良知”,所谓良知,就是指人内心潜伏的道德意识。“致良知”的修养方法包括“体认良知”和“实现良知”两个方面。

“体认良知”是指人本身的身心修养,包括“正心”“顿悟”“克己”等心上功夫,使先天固有的良知本体得以复明,“实现良知”实际上是道德修养见之于行动的问题,也是修养的目的所在。王阳明认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充分发挥主体道德意识的能动性,真心诚意致良知,就能真正破除“心中贼”,就能维护道德秩序。

其三,继承与破除的关系。运用道德现实主义的途径与方法来促成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应当格外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性,要谨防“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维定式。

事实上,除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孟子“恻隐之心,浩然之气”的义勇精神之外,我们还有老子“生而不有,长而不宰”的民主精神、庄子“通透之慧,天赋自由”的超脱精神、墨子“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韩非子“直面人生,矛盾法治”的现实精神以及荀子“事在人为,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等等。

只有全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精神、人文思想、教化理路、道德观念等,才能真正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有益启迪。这并不是“抽象继承法”,而是在诠释传统中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文化的需要。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组成员、研究员)

■ 胡月 李建军

上海要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提升“上海文化”走出去的效能至关重要。高效能的走出去不仅能有效提高“上海文化”品牌影响力,提升上海的城市软实力,而且能有效推动上海文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文化”走向世界,既为繁荣世界文化作出贡献,又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上海和中国。

三条路径

随着上海与世界的交流、交往的日益频繁,“上海文化”走出去的方式日益多样化。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几条路径:

一是通过经贸活动带动文化走出去。

上海作为国际贸易中心,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频繁。通过经贸活动推广上海,是实施“上海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方法。要以文创产品为核心,推进文化和金融、科技、装备制造、旅游等领域的跨界融合,使上海文创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实现更大规模的跨国流动。

二是通过教育合作促进文化走出去。

教育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有效媒介。国际上,许多大都市都在挖掘利用自身的教育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交流,提升城市形象。同时,教育贸易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占比日益攀升,已成为服务业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对上海来说,教育合作是世界各国了解上海的一扇窗口,也是“上海文化”走出去的一张名片。近年来,上海有9所高校在境外办学,上海数学教材漂洋过海进入英国小学。据上海市教委统计,2018年共有来自185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留学生来上海求学。

经验表明,教育交流是“上海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绿色通道。下一步,应继续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加大海外留学生录取,加强上海学校与国际教育机构的对接,探索“互联网+教育”的新模式,努力培养文化走出去的新生力量。

三是通过艺术交流推动文化走出去。

艺术超越时空、跨越国界,艺术交流是“上海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路径。特别是,音乐、舞蹈、曲艺、书画、建筑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交流,可以充分展现“上海文化”的美学特质,并通过心灵语言的对话、艺术上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上海艺术团体频繁亮相海外,上海艺术家在各大国际艺术节上屡获佳绩,上海传统文化结合新兴技术享誉国际艺术殿堂。下一步,在充分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我们要努力创造既包含上海元素又符合世界审美的艺术佳作,为“上海文化”走出去增添更为生动的色彩。

聚焦生产力创新力传播力

丰富的文化积累、腾飞的文化产业、新兴的传播平台、坚实的政策保障,是“上海文化”走出去的基础。下一步,提高“上海文化”走出去的效能,需聚焦提升文化的生产力、创新力、传播力。

一方面,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海文化”走出去,既要有各类显性文创产品,如书籍、影视作品、动漫游戏产品、演艺娱乐服务产品、文化设施设备产品等,也要有体现上海城市特色的精神、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时尚文化、生活方式等隐性文化。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宝贵文化资源,是上海文化输出的核心内容。红色文化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海派文化展现了海纳百川、开放创新、大气务实的城市气度;江南文化展示了独特的诗性审美、雅致情趣以及热爱生活的历史传承。三种文化互相交融、彼此激荡,共同赋予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现代性,又为“上海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丰富素材。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上海文创产业链,拓展融资渠道,广纳世界文创人才,着力打造全球影视创制中心、亚洲演艺之都、全球动漫游戏原创中心、国际创意设计高地、网络文化创作传播高地、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探索传统文化元素向移动多媒体、网络视听、数字出版、动漫游戏、虚拟现实等新兴形式的结合,促进文化创新;加强大数据、虚拟(增强)现实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不同区域范围、不同文化圈层的目标市场,要有准确的需求认知,要努力做到“量身定单”。

另一方面,用世界语言讲好上海故事。“上海文化”走出去,不仅要保持上海特色和中华文化精髓,而且要积极探索呈现与国际化需求相契合的产品内容,注重用世界语言讲好上海故事,让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都“听得懂、愿意听”。

第一,主题方面寻求共性。寻找全球或区域共通性话题,避免过于晦涩的本土题材或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主题。在此基础上,借助国际化产业模式讲好“上海故事”,切实提升优秀文化产品的海外主流市场占有率。

第二,风格方面探索突破。文化产品应有意识地融合上海风情、东方意蕴,形成具有更高辨识度的风格。形式方面还可以更加丰富多样,如大力推进文化产品的数字化建设等。

第三,渠道方面注重多元。可通过扩大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国际性节展的品质与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可精心培育新型主流媒体,推进媒体融合转型,提高国际传播力;可积极借助社交媒体,不断强化文化传播功能。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智库

「上海文化」如何走出去



学随林笔

在社会上游走,难以成就一流学问

■ 汪涌豪

做学问需要避免什么、注意什么,这里讲三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分业与综合。所谓的分业,是王国维先生在《教育小言》里说到的。他认为,今天是一个分业的时代。以前,我们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的知识是包罗万象的;随着学问的进展,大家分得越来越细了,搞古典学的不懂数学,搞文学的不知道史学、哲学。但近现代以来,不少大师其实都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

王国维的上述判断,对分业其实没有任何贬义。他自己显然也是关注广泛、善于综合的大家。在1901年到1907年那个阶段,即所谓“独学时代”,他把整个身心都放在读书与研究上,而且不仅仅限于文学,还有古文字学、史学和古等。

今天大家研究他的《人间词话》,都觉得这是一部杰出的词学理论批评著作,却很少有人讲到其中对德国哲学和美学的借鉴综合。事实上,在分业的时代,学人尤其要有综合的视野。

说起来,分业的观点是王国维提出的,但分业的时代早就开始了。《庄子》称“道术将为天下裂”,即意识到本来为学、论学是混沌的,后来却日渐走向精细。这种精细化产生的是诸子百家之学。诸子百家之学不能用现在所说的法学、伦理学或文学等来分判,这些学问本身就是综合式的。

由此,我们要处理好这样一对关系。一方面,要做一个专门家,在分业的时代把自己的

专业做好;另一方面,始终要有一个综合的视野,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再单纯,不再有严格的逻辑边界,而是与周围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中国当下的问题更是如此。

有一位历史学家叫杨人楩,早年写过一本《高中外国史》,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当时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书名不叫《高中世界史》,这样的题目似乎更贴合他作为世界史专家的身份,也更有气势,立意更高。但他表示,之所以突出“外国史”而不是“世界史”,是因为在撰写此书时心里总有中国史在。他希望别人在理解世界史时,心里始终要有祖国。所以,他写《高中外国史》,是将世界和中国比量着来看的。

其实,研究任何问题都要这样。研究东方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西方的视角;研究西方的时候,反过来也要有东方的思考。一个学者如果针对一个问题做得很深,却没有更广阔的视野,那要达到高境界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他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我们特别需要避免这种极端。

第二个关系,问道与问学。

今天,我们都走在问学的路上。学无止境,即使到60岁时,我们仍会有许多不懂的东西。当我们把知识边际扩大的时候,外延面的未知也就更多,纷纭复杂的问题向我们涌来,让我们总觉得追不上。所以,问学是一个终生的过程。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处理不完的,但当你想处理或必须处理时,你就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命合作支柱,这个支柱就是问道。

诸子百家中的《晏子春秋》里面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把它贴在儿子的书桌上,作

为他的座右铭:“问道者更正,闻道者更容。”原意是说:去问道的人会更正自己的选择,边上听说的人 would 改变他的神情。它还有更值得重视的衍生义,那就是追求道理的人会更加正大,懂得道理的人会更宽容。

由于《晏子春秋》没有明确是在哪个意义上用“正”与“容”,我们自然可以有如上的解说,并认为第二种解释相对第一种更有趣,也更有深意。

一个人问学的目的是什么?弄清楚一个问题,是学人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兴趣所在。那么,弄清楚这些问题是为了什么?这一点上必须指出,中国的一切学问都要从它的起因上说起。中国人问学的目的从来是为了问道,不仅从起因到动力是如此,而且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问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专注一隅而不及其余或者说心更广大问题的“书呆子”。

第三个关系,知道和知识。

这个世界,追求知识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知识分子,一种是知识份子。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对研究的东西都能通晓,甚至无所不知。对这样的人,我们并无太大的评价,因为他仅仅是知道而已。知识分子则不同,他对所知道的东西不止于通晓,而且会解构、会批判,会向这个对象投去自己的光来,使之产生新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以做一个知识分子为满足,而应以做好一个知识分子为追求。

知道分子经常在书斋求知,把知识弄得精而细。这自然是好的,许多时候还很有必要。但是,知识分子还将启蒙的担当视为自己的天职。今天,我们不乐见好在社会上游走的人,因

为其中确实有些人的发言超出了自己所知的边界,而且受到利益集团的诱惑。他们对一切公共问题都胡乱发言,所以大众很不满意。但是,知识份子能没有公共性吗?古今中外,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孔子、孟子,哪一个不热衷于对社会问题发言?风声雨声,国家事,哪一件不入脑入心?

所以,一个读书人既要能安居书斋求知,又要不忘“启蒙”。书斋求知需要尽量克服受黑格尔批判过的“利害之心”的指使,一定要告诫自己尽量摆脱这些东西。“启蒙”就是必须时刻不忘自己对社会是有责任的。

知识分子当然不能自外于人,更不应傲慢,但他难道不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吗?若他不是,总不见得网红流浪汉是。我当然不希望我出去的时候,许多人围着我,但如果都在追逐网红似的人物,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地方是不是生病了呢?

我以前常常给报纸写时评,对许多社会问题发言。这是在时间、精力允许情况下的“兼职”,虽没有专业,但绝对在务正业。在我看来,学到的知识一定要回馈社会、服务大众,要保证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能得到矫正。

总之,钻就要钻得非常深邃,全身心沉下去;超越时,又要超越到更高更广阔的境界。古今中外成一流学问的人,应该说都同时拥有这两端。希望随着学术条件和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也能到达这样的境界。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本文根据《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